

這間昏暗狹小的房間，擺上一張雙人床和一張書桌就難以轉身了；書桌上鑲在鏡框里妻子微笑的遺像，深情地凝視着房間的主人。屋子里除了寂靜還是寂靜，只有偶爾從窗外傳來幾聲鄰近小學操場上孩童的嬉鬧聲。

房間的主人叫趙振英，今年已經 93 歲了。老人滿頭白髮，儘管拐杖在手，走起路來卻依舊步履蹣跚。在過去的 30 多年里，他謹言慎行，就連看到街邊戴紅袖章的保安，都會感到些許恐懼。

在此前相當長的歲月里，連他的子女都不知道，他們的父親，曾親歷過中國百年歷史上最為榮耀的時刻，並在其中擔任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。

1945 年 9 月 9 日，中國戰區侵華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國民政府中央軍校禮堂舉行。這是中華民族近百年來抵抗外來侵略的第一次勝利，在這個最重要的歷史時刻里，時任國民黨新六軍 14 師 40 團第一營少校營長的趙振英，是投降簽字儀式會場內外警戒工作的負責人。

這本該是少校個人歷史上最為榮耀的一頁。但在此之後，因為國民黨軍官身份，他被打成“歷史反革命”，判刑、坐牢，妻子被迫與他離婚。出獄後，老人一直蝸居在北京西郊的一處居民樓里，並決定永遠將這個“秘密”爛在肚里。



南京受降儀式紀錄片中的趙振英

然而無意之中，一幅來自異國他鄉的老照片，以及一本寫滿簽名的筆記本，打開了這個老兵塵封已久的記憶。深圳的一家民營紀錄片公司聞訊而來，歷時近兩年，為老兵趙振英拍攝了一部紀錄片，名為《發現少校》。

“歷史就像陳年的膠片，免不了塵埃和劃痕，甚至斷裂。”這家公司的老總鄧康延說，“在時隔 65 年後，能夠為本民族的英雄找回榮耀，這也是我們的榮幸。”

一幅圖片掀開一段歷史

後來發生的所有故事，都與 2006 年初春的那個晚上，晏歡點開那個陌生的網站有關。

這個 50 歲的香港人，是建築設計工程師，現居深圳。他外公潘裕昆，曾任中國遠征軍駐印軍 50 師師長，先後參加過淞滬會戰、粵北戰役、緬甸戰役，是戰功卓著的抗日名將。

不過，小時候，晏歡並不十分清楚這段歷史。他只是隱約得知，外公曾是國民黨軍官，平日里，總是沉默寡言，甚至有點老態龍鍾。直至外公去世，他也沒覺得外公和其他老人有什麼區別。

一次偶然機會，晏歡看到一本介紹中國遠征軍的書。他吃驚地發現，外公的名字在書中被反復提起。他鄭重地問母親，才得知了外公的戎馬一生。

懷着對外公的些許負疚，晏歡開始了一段尋找歷史親歷者的旅程。在此後的 10 多年中，他一點一滴地打撈着與外公有關的歷史，並漸漸成爲一名中國遠征軍史的研究者。

2006 年初春的一個晚上，晏歡像往常一樣，在網上搜索與遠征軍相關的史料，無意間，他點開了一個陌生的美國網站。

在這個網站上，陳列着許多與遠征軍有關的史料。一頁一頁翻下去，晏歡突然發現了兩件此前自己從未見過的作品。

第一件物品是一幅老照片，照片上方有“陸軍新編第六軍軍官俱樂部開幕紀念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六日于南京”的字樣，照片的背景是一處假山，數十名中國軍官或坐或站，其間還有幾名美國軍官，有人端着酒杯，有人叨着雪茄，姿勢各異，個個臉上洋溢着輕鬆愉悅的神情。

第二件物品是一個紅皮的日記本，上面寫有新六軍許多軍官的親筆簽名，晏歡從中發現了許多自己熟悉的名字。他們都曾是外公潘裕昆曾經的同僚或部下。

晏歡很快聯繫上了這個網站主人，是一名美國人，叫尼爾·葛頓南(Neal Gardner)。他父親約翰·葛頓南(John Gardner)，曾是新六軍 14 師的一名美國少校聯絡官，于 1986 年去世。爲了紀念父親，2000 年，尼爾建了這個網站。他把父親從戰場帶回的所有資料和照片，



趙振英

少校歸來

一併放在上面。

徵得尼爾同意，晏歡將這兩件史料翻譯並轉發到了黃埔軍校網上，並開始尋找老照片上的這些軍官。他想知道，這些陌生的面孔都是誰？在這張照片的背後，究竟有着怎樣的故事？

在此後數月里，陸續有數個照片上軍官的後人聯繫上了晏歡。他們在網上看到了這張老照片，並一眼認出了自己的父親。

但讓晏歡有些失望的是，這些照片上的軍官本人都已過世。這幅照片背後的故事，或將永遠成爲一個謎題。

然而，2008 年 4 月，晏歡接到了一個來自北京的長途電話，長談了一個多小時。接罷電話，晏歡突然意識到，自己心中的這個謎題，終於“找到了最合適解答的人選”。

電話是趙振英的兒子趙精一打來的。這年的春節，趙振英的一戶遠房親戚來家中拜訪。這對年輕夫妻對遠征軍那段歷史頗感興趣，他們在網上搜索老人的名字與部隊番號，無意間進入了黃埔軍校網，並看到了晏歡發表的帖子。在那個小紅本上，趙精一看到了父親的名字，儘管過了這麼多年，父親的簽名依然沒變。

於是，趙精一輾轉打聽到晏歡的電話，並在 4 月的這個夜晚撥通了它。在此後一個多小時的交談里，晏歡吃驚地發現，電話那頭的老者，自稱是潘裕昆的老下屬，對於新六軍與 14 師的事情如數家珍。更讓他吃驚的是，老人還告訴他，自己曾是 1945 年 9 月 9 日南京日軍投降簽字儀式的警衛工作負責人。

放下電話，晏歡“興奮得全身發抖”。他決定，馬上去北京，拜會這個重要的歷史見證人。

2008 年 5 月 1 日，晏歡走進了位于北京西郊的趙振英家，也從此走進了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。

見證最榮光的時刻

1937 年 7 月 23 日的那個下午，趙振英搭乘“七七事變”後的最後一列客車，離開了故鄉北平城。

車上擠滿了逃離北平的難民與學生。擔心日軍開火，車頭上還掛了一面白旗。車過盧溝橋時行駛緩慢，趙振英甚至能看到，在遠處的日軍陣地上，有日軍軍官舉着望遠鏡向列車觀望。

鐵路的這一邊，是國民黨第 29 軍的陣地，中日兩軍處在對峙中，大戰一觸即發。滿載着平民的客車從中間地帶緩緩駛過，這個 20 歲的高中畢業生，心頭突然湧起一陣“屈辱感”。

趙振英原本的理想，是想考入北京大學。但隨着“七七事變”盧溝橋上的一聲槍響，這個夢想被徹底擊碎。從那一刻起，他和當時的許多熱血青年一樣，集聚到抗日救國的歷史洪流中來，立志要將侵略者趕出中國。

在此後的 8 年里，這個年輕軍官的戰鬥足跡遍布多個省份——湖南、四川、廣東、雲南。由於表現優異，他一路晉陞，1944 年 4 月，27 歲的趙振英隨中國遠征軍入印緬作戰時，就已經是少校營長了。

儘管作戰多年，但多半時間他都在軍部擔任參謀。在出任營長後，自己的部隊又始終被作爲預備隊使用，很少有真正上戰場作戰的機會，作爲一名軍人，這成爲他戎馬生涯中不小的遺憾。

然而歷史很快給了他一個萬眾矚目的機會。

趙振英所在的國民黨新六軍，被稱爲國民黨軍隊“王牌中的王牌”，軍長廖耀湘，是蔣介石的得意門生。1945 年 8 月，抗戰已接近尾聲，蔣介石點名要求新六軍進駐南京。他想用這支全副美式裝備的威武之師，向投降的日本人展示中國的軍威。

1945 年 8 月 28 日，趙振英的第一營從湖南芷江飛往南京。從跳出機艙踏上南京土地的那一刻，趙振英與他的士兵們注定將被載入史冊——這是在歷經了艱苦卓絕的 8 年抗戰之後，第一支收復首都的中國軍隊。

隨後，這個軍銜爲少校的營長又被上峰委派，負責 1945 年 9 月 9 日日軍投降簽字儀式會場的警戒工作。在許多參戰部隊眼中，這個任務被視爲“中國參戰軍人的最高榮耀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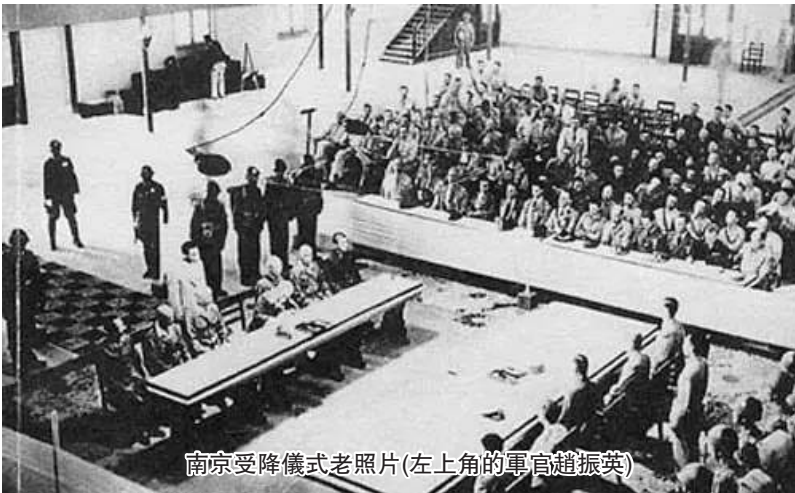
作爲一名抗戰史研究者，9 月 9 日南京受降儀式的全過程，晏歡原本已經十分熟悉，但趙振英的描述，又爲他補充了許多原本不爲人知的細節。

投降簽字儀式的地點，是在南京中央軍校的大禮堂。從禮堂門口一直到外面的大街上，每隔 50 米，就豎着一根旗杆，用藍白相間的布條包裹，旗杆上挂着同盟國中、美、英、法、蘇的五面國旗。

每根旗杆下，都站着一個全副武裝、精神抖擻的第一營士兵，他們身着綠色卡其布美式軍裝，戴着鋼盔與白手套，背軍用背包，手持美式衝鋒槍。爲了防止走火，士兵的槍膛里並沒有上子彈。

簽字儀式時，趙振英的位置在日本代表團投降席的左後方，他的士兵遍布整個會場，這些士兵的人數與站位，是趙振英在前一天就安排好的，並經過了再三演練。

在簽字儀式的 10 多分鐘里，會場里唯一能夠自由走動的，就只有趙振英一個人。他的任務，是時刻注意部下的軍姿，防止出現意外。更讓晏歡震驚的是，在他帶去的當時美國記者拍下的受降儀式老照片中，趙振英甚至



南京受降儀式老照片(左上角的軍官趙振英)

發現了一個疑似自己的身影。這張老照片的主體部分，是中國受降席與日本投降席，但照片的左下角，在一排士兵背後，站着一個面孔模糊的軍官，身着馬褲，腳踏長筒馬靴，腰間別着手槍，打扮與旁人明顯不同。

“這個人有可能是我。”在趙振英的記憶中，作爲會場警戒部隊的最高長官，爲了彰顯軍威，在受降儀式前幾天，他特意到會場附近的裁縫鋪里，訂做了一套馬褲制服。

而那張照片和簽名本上的故事，趙振英也記得很清楚。受降儀式後不久，1945 年 10 月 6 日，在南京的新六軍軍官俱樂部開幕。新六軍營級以上的新官，都出席了。那個時候，他們是衆人仰慕的英雄與勝利者，在最上方那排軍官的右

側，趙振英找到了自己微笑的面孔。

隨後，新六軍中的美軍聯絡官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離開了中國。在走之前，約翰·葛頓南少校拿出了這個紅色筆記本，讓在場的中國軍官在上面簽名，作爲對這段光榮歲月的紀念。

南京受降儀式，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爲顯赫的一頁。這是近百年來，中華民族第一次在抵抗外族侵略戰爭中取得勝利。這也成爲趙振英一生中最高傲的經歷。儘管時隔 60 多年，老人依舊記得當時的心情。

“略有些緊張，但更多的是興奮！”老人的臉上不經意地流露出一絲自豪感，“從甲午戰爭以來，中國就沒有打過勝仗，8 年抗戰，風餐露宿，終於把日本人打投降了！我能親眼目睹這一切，榮耀啊！”

只是，當年那個年輕的少校營長不會想到，一度被他引以爲傲的這份榮耀，很快變得黯淡無光。它先是被沖淡，然後被踐踏，之後逐漸凋落，像落葉一樣，被主人掃到內心深處最爲隱秘的角落，一藏就是幾十年。

少校變身工程師

在沒有遇見晏歡之前，家人從來都不知道，趙振英有過這麼榮耀的歷史。

趙振英的兒子趙精一清楚地記得，2005 年 9 月 9 日晚上，《新聞聯播》播放了南京受降儀式 60 周年的新聞，電視機前原本沉默不語的老人突然開口說：“那個時候，我在現場。”

“老爺子不會是老糊塗了吧？”趙精一和媳婦打心眼兒里不相信，在他們心目中，沉默寡言的父親，怎麼會有如此光榮的歷史？接下來，他們也沒有追問父親。

晏歡曾問過趙振英：“爲什麼你不告訴家里人呢？這多光榮啊？”

“我一直覺得這是臭史，是醜惡的歷史。”老人的回答戳痛了晏歡，“你想想，要是不醜惡，後來爲什麼坐牢呢？好人能坐牢嗎？”

在南京受降儀式後，趙振英只享受了短暫的兩個月的平靜生活。國共兩黨的內戰一觸即發，1946 年初，新六軍奉調北上，趙振英也隨部隊一起進入東北戰區。

不過，這個少校營長已經厭倦了戰爭，他只想圓自己的大學夢。1947 年，他參加了“留美軍官考試”，並獲得了瀋陽考區的第二名。在趙振英的記憶中，日後大名鼎鼎的歷史學家黃仁宇，“就是當年考上的幸運兒之一”。

但趙振英沒有黃仁宇那麼幸運——他最終落選，不得不返回部隊。歷史的大手，也把這支往昔的榮耀之師，推進了失敗的深淵。1948 年，新六軍在遼寧黑山附近被解放軍圍殲，大部隊被沖散，趙振英打扮成農民，趁亂脫離了戰場。

隨後，他一路南下，一直到杭州才停住了腳步。此時，已是 1949 年末。舊政權已被推翻，一個全新的政權，剛剛進入人們的視野。

趙振英在杭州租了一間民房，開始準備考試。因爲高中打下的底子很好，他報考的 5 所大學，都寄來了錄取通知書，最終，他選擇了南京大學，成爲工學院機械專業 1950 級的大學生，並在畢業之後，進入了一家國營工廠，成爲一名工程師。

從士兵口中的“趙營長”，變成工人口中的“趙工”，趙振英一度以爲，自己終於可以告別顛沛流離，開始平靜的生活。

可他錯了。

從“罪人”回歸常人

1966 年，“文革”開始，人們在趙振英的檔案中查到了他的歷史，從那時起，趙振英便陷入了一場長達 10 年的噩夢中。

每天早上，他上班之前，都要去工廠的傳達室領上一塊“反革命分子趙振英”的牌子，並把它掛在脖子上，下班後再交回去。革命群眾隨時都會對他發動批鬥，他彎腰 90 度站在人群中，戴着紅袖章的革命群眾圍着他，

用木棍肆意毆打。

擔心被人抄家，在一個深夜，這個工程師含淚燒掉了他的過往。那些戰場上的照片、徽章、以及能夠證明自己軍官身份的文件，隨着一陣火光，化爲灰燼。

3 年後的一天，兩個警察出現在他面前，他們讓趙振英在一份逮捕書上簽了字，給他戴上手銬，將他帶到了一個體育場里。這兒正在舉行一場公判大會，在革命群眾震耳欲聾的“打倒”聲中，趙振英以“國民黨反動軍官”的罪名，被判了 20 年有期徒刑。

監獄里的日子是難熬的。一張大通鋪，睡着 10 多個人，經常吃不飽。趙振英的活兒，是在一個燒磚的窯廠里，清理燒剩下的灰塵與碎磚。每天，他都要推着三輪車，在幾十個窑洞里